

浙江 新文学 名家研究

张颂南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依民

封面设计：毛一心

235
浙江新文学名家研究

张颂南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淳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0.75印张 24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ISBN 7-5615-0203-6

I·10 定价：3.80元

致 读 者

亲爱的读者：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也是建国第四十个春秋。我们出版这本《浙江新文学名家研究》第一辑，是一种回顾，也是一个纪念。希望她伴随着你的理性的思索和缪司的光华，增添你人生旅途上的兴味。

在源远流长的钱塘江两岸，自古以来，便是文人荟萃之地，特别是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以鲁迅为首的浙江籍作家，举世公认，是一支宏壮矫健的浙军。诸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冯雪峰、柔石、殷夫、梁实秋、戴望舒、巴人、林淡秋……以及今天尚活跃在文坛上的夏衍、艾青、唐瑛等等。他们都在浙江的城镇、山村或海岛渡过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童年。他们都以巨大的精力浇灌过新文学这束奇葩，而且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和艺术经验。尼采曾说：“人之所以成为人：他能思考、反省、比较、分析、综合着去限制那无历史的因素，这种能力，把过去运用到人生，并将已经发生的事再形成历史。”如此说来，历史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历史是死的又是活的，历史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老妇又是一个能悄悄走到我们现实人生中的少女。

我们综观以鲁迅为首的浙江籍作家群，他们的产生当然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浙江的文化背景分不开；同时他们大都又是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沿海商业之盛，交通之便，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虽然，他们或因个人气质各殊，或因接受文化相异，或因政治信仰分歧，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学风格，不同的文学流派，乃至有过互相攻讦的历史。但是他们在热爱人生、忠于艺术这一点上可说是共同的，都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在较长时期内，由于文艺思想上的偏颇，或者将富有独创性的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缩小封闭，或者将不同流派的作家看作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极，最近似乎又有一阵对有过杰出贡献的革命作家求全责备的风。我们认为这都不是研究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也会带来不利。尼采说得好，“能思考、反省、比较、分析、综合”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这也便是鲁迅说过的“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拿来主义。我们这本小书，如果能给你有什么启示的话，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迈出了我们要走的蹒跚的一步。

这是一本论文合集，书中共有十位作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文风也各异，甚至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我们本着百家争鸣、文责自负的精神，都不作观点性的删改，完璧付梓。如能得到你的批评和引起学术界的论争那更是我们所期望的了。浙籍作家需要研究的很多。浙江省文学学会编写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已收集了五四以后至建国以前浙江籍的现代知名作家、理论家、翻译家以及文艺编辑129人的小传。其中属于一、二、三流的作家，也不下于数十人。本书因种种原因，仅收6位作家的有关研究论文，也不以贡献大小或知名度的高低而定。目前，要出版一本学术著作真非易事，如果

日后条件许可，研究队伍扩大，我们期望着有系列的研究论著问世的一天。

当我们编定这本小书时，春天已经来临，美丽的西子湖已披上嫩绿的时装，在这大好春光里，我们把这个具有“浙江”印记的并不漂亮的姑娘远嫁他乡，交给福建省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厦门大学出版社还在筹划出版一本《现代闽籍作家散文》，本书与之配套出版，结成一段“姻缘”，岂不美哉！浙闽两省，素有“文物之邦”的共同美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古越族人在晋江流域生息耕垦，晋永嘉之乱后，“八姓之闽”“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我们新文学的开山鲁迅先生也在厦门大学渡过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段时光，我们的友谊可说是天成的。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并愿我们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天长地久。本书的出版也得到杭州大学领导和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89.4.10.杭州

目 录

喜剧和悲剧的交融

——论《阿Q正传》的一个艺术特色

.....郑泽魁 (1)

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心态和表现美学观念

.....张颂南 (21)

鲁迅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流派.....张颂南 (54)

鲁迅的美学与欧洲文化思潮.....陈元恺 (73)

鲁迅的创作与欧洲作家.....陈元恺 (98)

鲁迅论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钱文斌 (109)

茅盾中长篇小说的史诗特征.....钱诚一 (122)

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情节建构及其审美规范

.....钱诚一 (139)

时代感与历史感的溶汇

——茅盾小说风格研究之一

.....彭晓丰 (161)

宏大恣肆与细密幽微

——茅盾小说风格研究之二

.....彭晓丰 (173)

茅盾《农村三部曲》的地方色彩.....王国柱 (187)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沈绍鏞 (198)

郁达夫与林道·····	沈绍镛 (215)
冯雪峰——鲁迅研究的开拓者·····	郑择魁 (229)
夏衍剧作知识者形象剖视·····	陈 坚 (244)
《芳草天涯》人物论·····	陈 坚 (264)
夏衍剧本的淡墨风格·····	陈 坚 (284)
论林淡秋的小说·····	文 平 (293)
论林淡秋的散文集《交响》·····	文 平 (307)
茅盾与“立志”、“植材”·····	戈铮 王国柱 (317)
茅盾在浙江求过学的三所中学·····	王国柱 戈铮 (330)

喜剧和悲剧的交融

——论《阿Q正传》的一个艺术特色

郑泽魁

优秀的小说总是那么富有艺术魅力，它会吸引着你，让你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它，而且每读一遍会给你一些新的启示，《阿Q正传》就是这样的作品。

当我们反复阅读《阿Q正传》的时候，还会经历一种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先是觉得阿Q可笑，继而产生同情，进而对压迫阿Q的黑暗势力表示愤慨。我个人有这样的体验，不少同志和我有同感。将这种心理过程表述得最细致的，莫如冶秋的《〈阿Q正传〉——读书随笔》^①，他写得很生动，值得一读：

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

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

第二遍：才呕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

第三遍：鄙弃阿Q的为人；

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

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

第六遍：阿Q还是阿Q；

^① 该文收入路沙编《论阿Q正传》，草原书店1941年版，第98—99页。

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

第八遍：合而为一，

第九遍：又一化为你的亲戚故旧，

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四舍，

十一遍：扩大到全国，

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

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

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

不仅中国读者如此，外国读者也有类似的心理过程。据说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竟在笑了之后，嚎啕大哭”^①，他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有讽刺的现实主义杰作。……阿Q的可怜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②。

看来，这是《阿Q正传》给予读者的共同的艺术感受。从笑到悲愤，这一感情变化的过程，有长有短，其程度也有强弱的不同，但笑和悲愤两种感情的先后或交替出现，却毋庸置疑地说明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喜剧性和悲剧性的交融，我们试就这一艺术特色作一些探讨。

一、阿Q的喜剧性格

我们初读《阿Q正传》的时候，为什么会忍不住地发

① 转引自施昌东：《美的探索·论喜剧》，第444页。

② 转引自戈宝权：《鲁迅作品在世界各国》，《鲁迅研究资料》（1）第272页。

笑？这笑是由作品的喜剧因素引起的。据许钦文回忆：“照鲁迅先生口头说的，他写《阿Q正传》，原想通过阿Q的形象，指出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坏脾气来；阿Q是个坏习惯坏脾气多的典型人物。”^③鲁迅对阿Q的缺点给予善意的讽刺，将阿Q身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这就使阿Q成为一个有着喜剧性格的人物。

作为喜剧人物阿Q，他的性格特点之一是现实感的丧失，造成主观随意性与客观真实性的背离，以致做出种种违反常态的可笑行动。一般来说，人的思想行动与客观实际相符，就不会成为嘲笑的对象。当它与客观实际相背离，而这种背离又没有造成严重有害的后果，不致引起恐惧或愤恨的感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物作出的违反常态的反应，采取的不协调的行动，往往表现为一种自我否定，这就显得滑稽可笑。丧失了现实感的阿Q，他看不清周围的现实，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往往用幻想代替现实，当他将主观幻想付诸实践的时候，就会到处碰壁，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阿Q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不正视他和赵太爷之间阶级地位悬殊的现实，竟炫耀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接着他又不正视自己被赵太爷痛打的事实，却陶醉在赵太爷是他儿子的幻梦之中。这种脱离现实的精神上的自我陶醉，成为阿Q畸形性格的重要特点：明明被赵太爷打了一顿，却幻想成是被儿子打了；明明是屈辱地被逼自称为虫豸，却以“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而自豪；明明被抢走了钱，却用打嘴巴来取得安慰。总之，明摆着是处处受压迫、遭失败，不去正视，却以求得主观幻

③ 许钦文：《〈呐喊〉分析·阿Q正传》，第63页。

想上的胜利为满足，这就是阿Q惯用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由于阿Q虚幻的精神胜利和事实上的失败构成对比，因此，他越是因精神胜利而自鸣得意，就越显得荒唐可笑。他越是陶醉在精神胜利之中，就越是背离现实。所以，“精神胜利法”不但是阿Q丧失现实感的表现，也成为他丧失现实感的原因。堂吉诃德把风车当成敌人，阿Q则将失败看作胜利，在丧失现实感这一点上，他们几乎是相同的，他们同是喜剧画廊里的人物。别林斯基说过：“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是主观幻想的世界或者似乎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现实的世界。”^①阿Q的很多行动都缺乏合理的必然性，如遭赵太爷的打以后，按照合理的逻辑，应该是予以反抗，但阿Q不是这样，他反而躲到精神胜利的梦境中去。不敢面对黑暗的现实，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陶醉在精神胜利的主观幻想的世界里，这是阿Q喜剧性格的重要内容。

阿Q喜剧性格的又一表现是美丑不分，并且往往把丑自炫为美。喜剧的摹仿对象是人物身上的丑的东西，但丑本身不一定具有喜剧性质，只有把丑自炫为美的时候，丑才显得滑稽可笑，才产生喜剧的效果。阿Q头上留着癞疮疤，这是丑的。这种形体上的缺点，是落后贫困生活打在他身上的印记，本身并不能成为笑柄。但阿Q却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这就已经有点滑稽，后来进而认为“在他头上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这就显得十分可笑了。他身上长着虱子，这也是丑的，但他却与王胡比起捉虱子来，似乎虱子越多越大越光荣，因为比不赢，就骂将起

① 《诗的分类》，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383页。

来，这真是荒唐之极。他孤陋寡闻，却自以为见多识广；他因为城里人的有些做法和未庄不同，就奚落城里人，又因为自己曾进过城，就自以为要比未庄人高明一等。他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信奉所谓“男女之大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些伦理道德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解体，已成为陈腐的教条，阿Q却看作是“老例”“通例”，往往是“照例”行事，这就不能不成为喜剧中的丑角。

阿Q喜剧性格的根源之一是愚昧无知。他认不清现实，辨不出美丑，都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是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完全剥夺了劳动者受教育的权利。阿Q被束缚在繁重的个体劳动之中，只是在铺在地上的纸上画圈时才第一次接触到笔。这就使得他目光短浅，狭隘保守，再加上传统思想影响，喜欢“排斥异端”，更加不容易接受新事物。由于愚昧无知和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他竟把革命党遭受残杀的惨事，当作有趣的故事来传扬。后来他被抓到大堂上受审，糊里糊涂地认了罪，他不知道自己已被判处死刑，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不迭，真是麻木到极点。直到被押上囚车示众，还不知道反抗，反而想方设法去博取冷漠的观众的喝彩。这些可笑的行为，表明阿Q的理性已被蒙蔽了。阿Q的喜剧性格是封建蒙昧主义造成的。

鲁迅说过，他创作《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①。他在阿Q的喜剧性格里，概括了当时中国人中一些共同的弱点。其深广的程度，使差不多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

① 《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第24页。

自己身上找到与阿Q性格的某种相似之处。阿Q性格甚至超越了国界，很多外国读者也在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鲁迅运用他的卓越的艺术才能，锐利地揭出了被大家司空见惯的那些生活现象的喜剧性，指出他们已经成为可笑可鄙的东西，并且唤起人们的反感。读者从阿Q这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弱点，发现自己身上也有阿Q灵魂分子，有阿Q那种可笑可鄙的因素。因此，读者先是笑阿Q，继而笑自己，并在笑中带着不安，在不安中“开出反省的道路”，剔除自己身上的阿Q灵魂分子。

喜剧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作家的美学理想通过对丑的批判表示出来。鲁迅把阿Q身上那些愚昧落后、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就是希望人们能觉醒起来，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他希望人们要有明确的是非、强烈的爱憎，不要象阿Q那样浑浑噩噩、美丑不分；他希望人们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要象阿Q那样满足于精神上的胜利；他希望人们做向黑暗势力进攻的勇士，不要象阿Q那样成为黑暗势力的牺牲品。这就是鲁迅通过阿Q的喜剧性格表现出来的美学意义。

二、阿Q的悲剧命运

阿Q不但具有喜剧的性格，在小说中他还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按照西方古典的悲剧理论，悲剧应以伟大的高贵的人物为主角，有些评论者执着于这一点，就对阿Q这样的小人物能否称为悲剧人物表示怀疑。实际上，小人物不能成为悲剧主角的旧框框早就被打破。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普通人的价值受到重视，进步作家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遇，

表现小人物的悲剧作品也应运而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将“伟大人物”和“渺小人物”的命运作过比较，他认为“遭到悲剧命运的伟大人物比较少见”^②。鲁迅也曾经指出：“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③。在近代文学中，表现普通人的悲剧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鲁迅的《祝福》、《伤逝》等都是以普通人作主角的优秀的悲剧作品。

另一些评论者虽然承认普通人可以成为悲剧的主角，但认为阿Q没有悲剧性，理由是阿Q身上并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包括他的革命要求，都是应该否定的。阿Q只不过是一个对压迫者、奴役者十分向往和倾慕的奴才，因而他的毁灭也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了。这种看法不但背离作品的实际内容，也不符合读者对作品的艺术感受。

虽然，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的时候，确实曾经想把阿Q写成一个否定人物，写成一个坏习惯坏脾气多的典型。但写到后来，在小说的众多人物中，阿Q还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之一。在未庄及县城里，举人老爷、老把总、赵太爷、假洋鬼子等，是一批吃人的豺狼，使人痛恨；地保、赌徒和邹七嫂等人，也都势利刻薄，令人生厌，比较起来，还是阿Q较为质朴，较有人性。《阿Q正传》发表以后不久，就有人认为，鲁迅未能完全实现原先的创作意图，这是鲁迅的失败。其实，这乃是鲁迅的成功，是鲁迅现实主义的胜利，是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胜利。阿Q虽然是一个有很多坏习惯坏脾气的人，但阿Q终究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命运问题》，第29页。

③ 《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第293页。

者。鲁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了解，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使他终于把阿Q写成一个好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一个要求获得人的价值的人。

阿Q是一个“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①的劳动者，他“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非常勤劳肯干。在健全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应当获得正常的幸福生活。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过的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他上无片瓦，只能寄住在土谷祠里；下无寸土，只能靠打短工度日。他虽然最大限度地出卖劳动力，但是起码的生存和温饱都不能维持。他也有过个人生活上的要求，但这种合理的要求换来的却是一场“恋爱悲剧”，赵太爷之流乘机敲诈勒索，阿Q被逼得连破庙也不能住，短工也无处做，只得流浪到城里去做小偷。最后被老把总诬为抢劫犯，作为“惩一儆百”的材料，成为无辜的牺牲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鲁迅在当时为取得“人”的价值而提出的最低的要求。阿Q不但不能获得这些合理要求的满足，甚至连生存的起码权利也被剥夺，反动统治者无视人的价值，任意草菅人命，真是为所欲为。鲁迅曾经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②阿Q就是一个连奴隶都做不成的人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象阿Q这样的受压迫、被残杀的劳动者，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的正当的权利被剥夺，合理的要求遭压制，“人”的价值完全丧尽。阿Q无辜被枪杀，就是黑

① 《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17页。

②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

暗旧势力对“人”的价值的摧残，这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

阿Q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肉体生命的丧失，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的毁灭。阿Q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一个靠做工为生的人，在健全的社会里，他应当具有正常的美好的人性。可是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他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受到陈规陋习的影响，在他的心灵上染上了不少污浊的东西，再加上专制主义制度的压迫，使他的正常的人性被扭曲。阿Q并不是生来就不尊重自己，他也曾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不可能，他受到的是侮辱和欺凌。他想从精神的胜利中来保持一点自尊心，又不可能，就用自轻自贱的办法来解脱。当阿Q称自己为虫豸，打自己嘴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已经完全丧失。更令读者痛心的是阿Q竟用欺凌比他更弱的人来取乐。他在遭了假洋鬼子的毒打以后，不能象一个正常人那样起来反抗，却向小尼姑发泄。小尼姑是比阿Q更弱的弱者，阿Q对她不但没有人类应有的恻隐之心，反而从小尼姑“带哭的声音”中换取“得意的笑。”这已不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的丧失，而是人性的异化，从人性转化为非人性。当阿Q用欺侮小尼姑的办法来博取“看客”笑声的时候，我们是笑不出来的。鲁迅曾经沉痛地指出：“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①阿Q的人性遭到“圣人和圣人之徒”的戕害，造成他精神上的毁灭。这种精神上毁灭的悲剧，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鲁迅痛感国民灵魂的沉默，就是这种精神毁灭的悲剧造成的。

①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77页。

阿Q的悲剧命运，在“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等三章中表现得更为深刻。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推动下，阿Q萌发了革命的要求，这是阿Q性格的重大的发展。毋庸讳言，阿Q对革命的真正意义并不理解，他是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来看待革命的，再加上他受到反动宣传的影响，对革命难免有很多的错误的看法。鲁迅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严格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恰如其分地表现阿Q的革命要求。他对阿Q的糊涂观念和愚蠢行动是否定的，而对阿Q的革命愿望是同情的。作者真实地揭示了阿Q革命要求的历史必然性。在“革命”之前，阿Q经历了“恋爱悲剧”，无法解决“生计问题”，他受尽了压迫、剥削和凌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精神胜利法”已无法解决他面临的现实问题，于是，他心里的不平分子就自然地增长起来，对逼得他走上末路的赵太爷之流也更加不满。正当阿Q处于无路可走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使得举人老爷和赵太爷之流惊慌失措，阿Q自然感到快意。象他这样一贫如洗的人，并不怕在革命中失掉什么。相反地，既然革命使有钱人害怕，当然会对穷人有利。阿Q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出发，必然会拥护革命，迫切地要求参加革命。他希望革命能改变他的贫困的处境，结束他那种被人凌辱的生活。虽然他也有不少非分之想，但不能不认为，他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是出于一种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阿Q从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到向往革命，他的愿望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是一致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群众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过着和阿Q一样悲惨的生活，他们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因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